

从《西行漫记》看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调整

李燕伶

(北京联合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市, 100101)

摘要: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撰写的《西行漫记》是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革命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纪实巨著, 曾被毛泽东评价为“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 介绍了我党的政策”。《西行漫记》中详细记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生活情况, 其中包含了大量他域视角下的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调整的相关内容。探究书中党的宗教政策调整的背景原因和调整措施,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 《西行漫记》; 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 宗教政策; 民族

中图分类号: D2 字号 **文献标识码:** A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的宗教政策随着革命主要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 党对宗教政策及时作出了重大调整, 使党的宗教政策在这一时期逐渐趋于成熟。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地区进行采访并整理著成《西行漫记》, 用真实的视角向外界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共产党, 书中还记载了大量这一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相关内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充分考虑我国宗教与民族的实际情况, 灵活调整了党的宗教政策, 妥善解决了党与宗教、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 为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开展宗教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会议上多次对党的宗教工作发表重要论述, 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深入研究《西行漫记》中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调整, 有利于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认识, 并为正确认识新形势下我国宗教问题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一、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调整的历史背景

党的宗教政策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党在成立初期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 党的宗教政策总体上是适应当时革命发展需要的。大革命时期, 党对宗教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党的宗教政策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得以完善。大革命失败后, 由于“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实施, 导致党的宗教政策和党的宗教工作遭受严重挫折。1935年1月,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党的宗教政策重回正轨, 宗教工作取得新的重要成果。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社会主要矛盾急剧变化, 党的宗教政策有了新调整, 党的宗教工作取得了新进展。这一时期, 党的宗教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 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是根本原因。党在成立初期, 主要从事领导工人运动。从1924年至1927年, 党同国民党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人民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集中表现在阶级矛盾上, 加上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 党在一段时期内忽视了对宗教界人士的团结和联合。随着九一八事变的

爆发尤其是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急剧变化,即由阶级矛盾逐渐开始向民族矛盾上升,也就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日救亡的艰巨使命,为了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团结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不论阶级、信仰和地域等区别的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于是,结合国内革命形势的实际以及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党对宗教政策进行了调整。“共产党的宣传已经造成普遍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们马上有受到‘日本倭子’奴役的危险”^[1]在全国范围内无论男女老少和信教或不信教的人士都感受到了民族危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推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调整的根本原因。

其二,长征途中的实践经验积累是重要原因。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等党的主力红军进行了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先后经历了湘、黔、桂、滇、川、康、青、甘、陕、宁等十一个省份的数十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这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大多信仰宗教,且信仰的宗教各有不同。党在长征途中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党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稍有疏忽,极易造成党与少数民族的对立和宗教关系的矛盾。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党在一定时期内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视不够,致使长征前期党的少数民族宗教工作进展艰难。遵义会议后,党开始创造性地探索民族与宗教的政策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进程。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党在这一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党和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得到妥善解决。途经大凉山彝族聚集地区时,“刘伯承在彝族的总首领面前同他们一起饮了新杀的一只鸡的血,他们两个按照部落传统方式,歃血为盟,结为兄弟”^[2]消除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猜忌和敌意,取得了彝族同胞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党在红军长征中格外强调军队纪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宗教界人士,保护信教群众利益,使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深入人心。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的哈达铺、通渭回民区,为尊重回民习俗和伊斯兰教信仰,红军政治部在颁布的《回民区域政治工作》中规定:“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毁坏回民经典”^[3],受到回民的热烈欢迎。可以看出,长征途中党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践经验,是推动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宗教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

其三,宗教界人士对革命的影响是直接原因。党的二大决议提出,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是否有宗教信仰都可以加入工会,在农村的农民不论是否有宗教信仰均可加入农会,但规定职业宗教者不得入会。在革命的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二大决议基础上采取进一步团结宗教界人士以巩固革命力量的政策。“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中国共产党合作。”^[4]红色牧师董健吾等一批宗教界人士就是在这时期投身革命,壮大了处于革命低谷的党的革命队伍。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空前的反日浪潮。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许多宗教界人士积极相应党的号召,推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党的各项政策紧密围绕这一方针作出调整,使宗教界人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如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天主教爱国人士马相伯、西藏第五世格达活佛等爱国宗教界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投入到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之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许多宗教界人士对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响应和支持，是推动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宗教政策调整的直接原因。

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调整的具体表现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紧密围绕党的革命任务的变化而进行了及时调整，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党在这一时期宗教政策的调整，对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推动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党推动从土地革命战争过渡到抗日战争并取得抗战最终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西行漫记》看，党对宗教政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调整。

其一，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外来宗教及传教士。党对传教士的态度随着党对外来宗教的深入认识而不断深化。党在成立之初，将外来宗教与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一并加以批判。随着革命的推进，党深刻认识到宗教问题是中国革命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客观上要求党结合实际全面认识和对待传教士。遵义会议后，党对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传教士告诉我，……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5]斯诺与传教士的对话表明了这一时期传教士在陕北苏区活动频繁，只要传教活动遵守法律，其活动自由不受限制。斯诺还提到，“所有外国教会的财产受到了保护，外逃传教士被请回去到他们的教民那里去工作”^[6]外国教会受到的保护和传教士受到的尊重，这是此前党的宗教政策中从未有过的。党在尊重和保护外国传教士的合法利益的同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共产党保留了进行自己的反宗教宣传的权利，认为‘反对做礼拜的自由’同做礼拜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民主的权利。”^[7]这表明，党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国情和宗教实际相结合，在革命中灵活调整和运用党的宗教政策，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政策对待传教士，党的宗教工作在宗教政策调整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其二，联合宗教界人士结成统一战线。在革命实践中，党把宗教问题纳入到革命统一战线的范畴。党在解决宗教问题和处理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问题上，坚持政治上的团结与合作、思想信仰上的尊重与包容的重要原则，联合宗教界人士初步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1936年1月，根据党的十大纲领与抗日救国主张，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在革命根据地纲领中指出，“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实行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和恶霸的压迫，反对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歧视”^[8]，提出了民族平等政策。同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和全国公教联合会、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回教徒联合会等宗教团体发出号召，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党的宣言成效显著，革命根据地内无论信教与不信教，也不论信哪种教派的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党的政策得到了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是一种新现象。”^[9]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实践进一步巩固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越来越多的宗教界人士投身到党的革命事业之中，“贾河忠说，那家基督教医院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加入了红军……附带说一句，我在红军中间遇到过好几个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10]这一时期，党团结和联合一切赞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抗日的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团体，保障他们的各项合法权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在调整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宗教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其三，初步形成党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长征时期，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少数民族及宗教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党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主要包括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与民族自治政策，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

政治、文化等事业。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人口众多，主要包括回族和蒙古族，并且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宗教。实践证明，处理好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问题，有利于维护革命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党和红军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与风俗，“他们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也留下了印象。”^[11]

“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人还在军号锣鼓鞭炮声中拜访了清真寺，把一面绣着‘德高望重’的锦缎匾额送给了阿訇”^[12]，赢得了阿訇和穆斯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党始终同少数民族同胞保持血肉联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宗教界积极力量共同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这一时期陕北苏区的广大回族同胞在党的领导下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空前提高，“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回民中间也有汉人血统；我们都属于大中国……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革命。”^[13]此外，党还致力于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斯诺在书中提到，“他们（回民）读了，或者听家人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的简单介绍，每天关于回民当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课。这些课不是汉人给他们上的，而是共产党中回民党员给他们上的，后者上过共产党的党校。”^[14]为最大程度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党向少数民族群众提出帮助他们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建立区域自治政府。党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极大团结了少数民族同胞，壮大了党的革命武装力量。

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调整的现实启示

从《西行漫记》看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宗教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党已经开始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而推动党的宗教政策的与时俱进。探析这一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调整，对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必须坚持党的宗教政策。党的宗教政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同我国宗教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策结晶，是指导党的宗教工作的行动指针，必须全面贯彻，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指导党的宗教政策制定的科学指南，具有实践性、发展性和科学性。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的调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取得了新突破。党的宗教工作的历史表明，党的宗教政策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创新，在实践中坚持和完善。1991年1月，江泽民在与我国宗教团体的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在宗教工作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团结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15]。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宗教工作的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党的宗教政策，必须正确把握基本国情、宗教教情尤其是宗教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也要结合实际不断完善和创新党的宗教政策，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努力为社会持续发展、社会安宁稳定、文化繁荣兴盛、民族团结和谐和祖国完全统一服务。

其二，必须巩固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坚持和完善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新时代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要举措，是党的一项重要宗教政策。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的调整，初步形成了党同宗教界人士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党同宗教界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等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深化。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

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16]坚持和完善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基调，全面做好信教群众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复兴强国的力量。

其三，必须完善党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党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落脚点是维护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民族繁荣发展。我们党尤为重视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由于民族宗教问题有其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所以党始终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待民族宗教问题，党在各时期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依据实际情况和党的中心任务不断调整完善。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的宗教政策在调整中开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党结合实际又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能够正确解决我国民族与宗教关系问题的重要前提。坚持和完善党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是新时代坚定党领导民族宗教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扩大党同少数民族宗教界爱国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是尊重少数民族平等地位、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7]踏上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应汲取历史经验，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宗教政策体系，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团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 [1]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10.
- [2]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90.
- [3]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44.
- [4]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9.
- [5]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216.
- [6]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374.
- [7]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374.
- [8]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48.
- [9]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222.
- [10]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373.
- [11]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328.
- [12]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59.
- [1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328.
- [14]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327.
- [15] 邹爱国.江泽民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作客中南海指出——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保持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J].法音,1991(03).
- [16]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N].人民日报.2016-4-24(1).
- [1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

The adjustment of the party's religious policy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in "Red Star Over China"

Li Yanling

(College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e famous American journalist Edgar Snow's "Red Star Over China" is a documentary masterpiece reflecting the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and bas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which was once evaluated by Mao Zedong as "truly reporting our situation and introducing our party's policies." "Travels to the West" details the real life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of northern Shaanxi, and contains a lot of relevant content about the adjustment of the party's religious policy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 regions. Studying the background reasons and specific adjustment measures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party's religious policy in the book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relig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party to correctly handle ethnic and religious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properly resolve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adhere to the direction of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s in our country, and actively guide our country's religions to adapt to socialism.

Keywords: Red Star Over China ;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religious policy; ethnic group

作者简介: 李燕伶, 男, 1999年6月, 汉族, 贵州赤水人,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